

社 会 与 历 史 译 丛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英〕佩里·安德森 著
郭方 刘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 会 与 历 史 译 丛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英〕佩里·安德森 著
郭方 刘健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英)安德森(Anderson)著;
郭方,刘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08-03511-3

I. 从... II. ①安...②郭...③刘... III. 社会发展史—欧洲—中世纪 IV. 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7447号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Copyright © Perry Anderson 1974

本书由著作权人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未经同意,
不得翻印、转载。

本书据 Humanities Press 1974 年版译出。

责 任 编 辑 曹培雷

封 面 装 帧 甘晓培

编辑、出版总策划 朱金元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英] 佩里·安德森 著

郭方 刘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249,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511-3/K·836

定价 23.50 元

社会与历史译丛编委会

刘北成(执行)

郭 方(执行)

刘新成

朱孝远

杨 豫

沈 汉

侯建新

渠敬东

李 康

李 猛

王明毅

中译者序言

本书作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是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1938年生于伦敦,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与社会学教授,英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期刊负责人。《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及其续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出版于1974年(伦敦新左派丛书, New Left Books),是在西方历史学、历史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领域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著作。

安德森青年时代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学,掌握了九种外语,这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安德森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并参加了西方的“新左派运动”,1962年起成为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主要编辑。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的深入研究,并与现实政治、社会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他认为,虽然西方各国都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是在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具体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上各个地区、各个层面上的相互联系和差别的规律方面还做得很不够。^[1]尤其是将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多种发展变化同社会发展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从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和近代从封建社会

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总体上作相关联的比较研究,是世界史、历史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键问题,必须将不同国家、地区的史实联系起来,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论述。安德森认为,应当将经济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同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国家政治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研讨。^[2]他强调,阶级之间的现实斗争最终要通过社会政治领域的斗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领域来解决。只要阶级继续存在,只有建设国家或破坏国家才能确立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3]

安德森这两部著作就是他对这些重大问题研究的成果。尽管当时安德森还是一个年仅 36 岁的青年学者,但在其著作中体现出的学术功力得到了史学各领域权威的高度评价。古希腊罗马史专家芬利(Moses Finley)说:“这是对欧洲从古希腊到近代绝对君主制历史精彩地组织起来而又有有条不紊的综述,读起来激动人心。”中世纪史专家希尔顿(Rodney Hilton)说:“这是对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富启发性的渊源介绍之一。……对于欧洲的东部和西部,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封建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作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性综述。”近代史专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这是十分杰出的、具有权威性和透彻性的学识成就。”^[4]其他学者也将这两部著作称之为“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和“马克思主义的杰作”。^[5]二十多年来,安德森的这两部著作在西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众多著作中一直是权威性的引证来源,也是我国世界史有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安德森还计划续写第三册《从尼德兰起义到德国统一时期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和第四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虽然它们至今尚未问世,但由此

可见,《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论述和研讨的视角并不限于古代与中世纪,而是着重于追溯现代社会和国家的起源,把握社会和国家形态发展史的全过程。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分为两篇共四部分,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国家形成到公元15世纪欧洲封建主义危机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的欧洲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第一篇第一部分“古典时代”论述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生产方式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指出海外征战、贸易和奴隶掠夺是奴隶制城邦国家建立发展的重要条件,并且分析了古希腊、希腊化国家和罗马的城邦国家及帝国形成、发展和衰落在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古典奴隶制国家需要以不断扩张来解决因扩张引发的内部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变化而产生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奴隶制国家的崩溃。第二部分“过渡时期”首先论述了公元头几个世纪日耳曼人原始的部落组织和土地公社共有形式,随后在日耳曼人迁徙和入侵罗马帝国边界后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指出,在日耳曼人迁入的罗马帝国西部和受罗马影响较大的日耳曼人定居地区,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公社生产方式同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同比例、不同程度的冲撞,给全欧洲及相邻地区造成了三种状况,即古代奴隶制残余与西亚北非更古老的国家社会形态残余并存的地区,原始部落公社生产方式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古典奴隶制残余与原始部落公社制残余影响相差不大而并存的地区。只有在最后这种状况存在的地区,原始部落公社制和古典奴隶制这两种已趋消亡的生产方式的碰撞才产生了一种新的综合,即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形

成的这种历史地理条件,对欧洲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形态演变的不平衡和多样性有着重大作用。

本书第二篇论述欧洲封建主义的发展史时,分为西欧与东欧两部分进行比较研究。作者首先分析了在西欧形成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即农奴制、庄园领地制、统治者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封君封臣等级制和国家权力的分割化。然后作者分论了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封建主义形成时期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指出,由于封建主义诸因素形成得或早或晚,发展得完整或不完整,各个因素间结合的程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形态,即王权、贵族领主、教会、城市的不同力量对比和平衡,这对这些地区和国家此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北欧地区虽然没有古典奴隶制的残留,但由于北欧海盗较早深入西欧侵掠和贸易,因而较快引入了西欧封建主义体制。封建主义形成后,在 10 到 13 世纪期间产生了扩张的动力,进行了大量土地开垦,并向易北河以东入侵殖民,从伊比里亚半岛向南推进,还发动了十字军东侵。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市民阶层有力量和条件在主权分割化的封建主义国家系统中发展出有自治权的城市,成为商品货币经济的中心。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不久就由于生产力的局限,阶级和社会矛盾的加剧,灾荒和瘟疫的打击,在 14 世纪爆发了总危机。农奴制、庄园制和封建等级制在这场危机中均开始瓦解,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了已有相当发展规模的商品货币经济,以货币地租、农民“解放”补偿金、劳动力雇佣的方式使西欧封建主义渡过了这次危机,并且为封建主义国家向具备国家税收、官僚和常备军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演变提供了条件。在这种国家体制中,虽然王权与贵

族仍居于统治地位,但市民和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中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制衡作用。

欧洲东部封建主义的发展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从易北河以东直到顿河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及其他部落,没有受到罗马帝国古典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影响,因而国家形成和封建化的进程很缓慢,亚洲游牧部落向这个地区一次次迁徙的冲击又经常打断这个进程,其影响延续到蒙古人对东欧的入侵和对俄罗斯的统治。在欧洲西部封建主义扩张时期入侵、殖民和文化宗教传播的影响下,东欧的封建国家才较持久地建立起来,但由于封建等级制、农奴制、庄园制及工商业市镇这些封建主义因素还都没有充分发展时,就在14世纪遇到了遍及欧洲的封建主义总危机的打击,东欧封建统治阶级应付危机的手段是强化和巩固形成中的农奴制和庄园领地制,通过强化超经济强制的力度和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以应付来自西欧的军事压力和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贸易需求。在这种条件下,东欧形成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与西欧不同,是以农奴主、领地庄园主贵族阶级为支柱的君主专制,没有市民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与经济、政治制衡力量存在。东西欧在封建主义危机中形成的表面类似而实质不同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形态,对东西欧近现代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西欧通过改革或革命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欧则通过反封建专制,反外来压迫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等,力图摆脱从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走上了一条反复曲折的道路。

东欧多瑙河以南部分更有其特殊性。由于拜占庭帝国长期占领这片地区,南部斯拉夫人建立的诸国在与拜占庭的斗

争中屡经兴亡,极少受到西欧封建主义的影响。受帝国官僚机构控制的大地产制占有重要地位,城市也在帝国政府的严密统治之下。这个地区不断受到宫廷、民族、宗教斗争和亚洲游牧部落迁徙入侵的冲击,最终奥斯曼土耳其人在 14、15 世纪逐步征服了这个地区,灭亡了斯拉夫人诸国和拜占庭帝国,使这个地区在近代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其他地区相分离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直至 19 世纪起,才又成为欧洲一个充满特殊的严重问题的地区。

安德森的著作和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长期广泛的讨论。安德森在论述历史上各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衰落和过渡问题时,一方面,不赞同任何国家、地区都会按同一模式自然依次发展出各种社会形态的“简单进化论”,强调要从全欧洲、全世界整体的视野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着眼,重视各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碰撞、传播、接受、综合,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并且不应只从经济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应着重讨论国家形态和政治斗争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安德森也不赞同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各有其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全世界和全欧洲总体的历史来看是符合实际的,只不过不能将这种规律简单化、孤立化,而应当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多维的结构功能上的相互作用,并从各地区、国家间具体历史的联系和互动中,深入理解社会形态发展过渡的轨迹。^[6]

安德森的理论也受到了某些批评与质疑。一方面是由于安德森的历史理论中有着结构功能主义的明显影响,对于国家体制、法律、宗教、思想意识、文化等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

演变产生的相对独立的能动影响估计不足,因而他的历史理论体系虽然看起来完整严密,但对某些历史上重大的能动变数似乎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7]另一方面,由于安德森将欧洲西部的古典奴隶制、封建主义和绝对君主制作为典型,而将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看作是“变种”、“不完全的”、“迟到的”或“接受的”等,因而被认为是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和马克斯·韦伯考察历史与社会以西方为“理想类型”的影响。尽管安德森在续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专章讨论了伊斯兰教国家和日本的封建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仍是以西欧为参照系的。虽然从安德森对历史的整体考虑来看,其目的是要阐明,只有在西欧及北美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说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获得胜利,否则在苏联东欧这样的“非典型”地区的社会主义就是不成熟和不巩固的。他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历史进行总体考察,就能推导出符合现实实际并有益于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但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正反映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即他们毕竟不能脱离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和社会。^[8]不过近二十多年来,包括安德森在内的许多学者在考察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已进一步认识到了深入理解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对研讨全世界的过去、现实和未来问题的重要性,并已体现在他们的论著之中。

佩里·安德森还撰写过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名“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9年出版)、论文《文明及其内涵》(中译文载《读书》1997

年第 11、12 期)、论文《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 年 4 月号)均已译介到中国。其他一些关于英国近现代史的论著也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9]

本书第一篇第二部分与第二篇由郭方翻译,第一篇第一部分由刘健翻译。安德森教授对本书及续作译为中文给予了热情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做了高水平的辛勤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郭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注 释

- [1]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71.
- [2] 同上书, p. 177—178。
- [3] 同上书, p. 170。
- [4] Anderson, P., *Passages from Autiquity to Feudalism*, Verso, 1978, 封底页。
- [5]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p. 170, Tariq Ali, D. G. MacRae.
- [6] 同上书, p. 197—198。
- [7] 同上书, p. 177—180, p. 197—199。
- [8] 同上书, p. 182—183, p. 197—202。
- [9] Anderson, P.,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Anderson, P.,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1983; Anderson, P.,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Anderson, P., *The Notion of Capitalist Revolution i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1992.

致 谢

我要感谢安东尼·巴尼特(Anthony Barnett)、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朱迪思·赫林(Judith Herrin)、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汤姆·奈恩(Tom Nairn)、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和加雷兹·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对这篇文章或它的续篇的批判性评论。由于这两篇文章的性质,他们对于其中所包含的论据或解释中的错误,比起一般而言当然更没有任何责任。

前 言

7

对这篇论文的范围和意图有必要作些解释。它是作为一项更长的专门研究的序论而设计的,这项研究的题目是直接衔接此文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这两本书是相互结合的,并最终表达一个单一的论证。以古代和封建主义为一方,以绝对主义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对它们大多数论述的通常观点而言,不是直接显而易见的。通常,古代史与中世纪由于专业上的隔阂而被分开,极少有当代的著作将其连接起来:它们之间的鸿沟当然是由教学和研究体制上的壁垒造成的。在中世纪史和早期近代史之间的距离通常要小得多(这是自然的还是反常的?),然而这也常常足以阻碍将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放在单一的视点之内进行考察。这些相互联系的研究的论据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它是一种方法,用它可以研讨有关的一连串形态。现在这篇论文研讨的是古典古代的社会与政治世界,由它向中世纪世界转变的性质,欧洲封建主义最终形成的结构和演变;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的地区性划分,自始至终是一个中心论题。它的续篇是在封建主义和古代的背景下,讨论作为它们正常的政治继承者的绝对主义。在对绝对主义国家进行比较性的综述之前,先对古典古代和封建主义进行一次纵

- 8 览的理由,在这第二部著作本身的论述过程中会越来越明了,并在其结论中予以总结。这些将欧洲的经验特殊性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中的努力,是以这两部书的分析作为观点的依据的。

然而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两本著作中作出的论述具有有限性和暂时性的特点。它们缺少专业历史学家的学识和技艺。正规意义上的历史写作不能离开对过去原始记录——档案的、碑铭的和考古学的直接研究。下面的研究不能宣称有这种高的水平。它们并非是像这样真正的历史写作,而是只以现代历史学家可以利用的著作的学识为依据,这是非常不同的主旨。因而所附加的供参考的注释,是与表示一部著作在学术上的历史编纂水平正相反的。拥有权威的人是不引用它的;出处本身,即过去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他自己讲出来。这些用于证实这两部著作正文的注释的类型和分量只是表明它们处于第二手的水平。当然,历史学家们自己有时也会写出比较或综合性的著作,而不必总是直接熟悉相关领域中整个范围的根据,虽然他们的判断可能因他们掌握的专业而有局限。就其本身而言,对这种描述或理解非常广阔的历史结构或时代的努力,没有必要作过分的解释或辩护:没有它,专门的和局部的研究会失去它们本身潜在的重要意义。但依然确实的是,没有比这类解释更容易犯错误的了,如果它们所依赖的结论如同它们基本的证据要素那样是扩及本题之外的话。因为它们仍会因进一步的第一手调查研究而得到的新发现或修正而常常变得没有价值。被一代历史学家所普遍接受的,仍可以被下一代人的研究所驳斥。任何在现有见解的基

础上作出一般化概括的努力——不管这些见解多么有学问——都不可避免地是不确定的和有条件限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这些文章因其所包含的时间跨度,局限性特别大。事实上,考察的历史范围越广,与其任何阶段相符的论述就会越趋于简短。在这种意义上,过去详细而难以了解的复杂性只能由历史学家描绘的色彩丰富的油画记录下来,其中大部分是处于这些研究的范围之外的。下面所提供的分析由于限于能力和篇幅,只不过是基本的图解。它们对另一种历史作简短的概述,是打算提出供讨论的要点,而不是阐释结论性的或综合性的论点。 9

它们计划进行的讨论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之内的。它们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目的,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前言中已作了陈述,在这部著作的形式结构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在这里不需多讲,只要说明在这两部研究著作中运用资料的指导原则就行了。这个综合考察所利用的权威性根据,就如任何基本上是比较性的调查探讨那样,自然是极为多种多样的,在知识和政治特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别样的特权给予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本身。尽管近几十年有了变化,20世纪大量严肃认真的历史著作还是由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完成了的科学;也不是所有从事它的人都有类似的能力和水准。在有的历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占主导地位;而在更多的领域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在质量和数量上则超过马克思主义者;或许还有更多的领域中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参与研究。在一项必须考虑到出自如此不同范围背景的比较性考察中,唯一可行的鉴别标准是它们本身的坚实可靠

和才智。最大程度上了解和尊重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的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与严格地追求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探讨,是并不矛盾的,而是它的一个条件。反过来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决不能简单地采纳他们说过的话:他们著作中对过去论述的错误不应回避或忽略,而应予以鉴别和批判。这样做并没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维护了它。在理性认识中,没有任何唯信仰主义的地位,它必须不断积累;新科学奠基人的伟大从来没有保证不会有判断错误或形成不真实的神话,这并不会对他们有更多的损伤。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签过字的东西“冒昧更正”,只不过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性。